

耶稣会士与新教传教士对《京报》的节译

尹文涓

《京报》是由中国古代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发展而来，曾被称为“邸报”、“邸钞”、“朝报”等，到清初始固定报名。《京报》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报纸的最高级形式。本文以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对清朝《京报》的翻译为个案，来思考来华传教士在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的文化情报时所出现的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

关键词：《京报》 翻译 耶稣会士 新教传教士

作者尹文涓，1972年生，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比较文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一、《京报》简介

清兵入关时，一所名为“荣禄堂”的报房获准继续编印刊发“京报”，封面印有红色“京报”二字，自此出现《京报》这一固定报名。^①道光年间一份在华发行的英文刊物上，有一段关于《京报》的记载，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晚清《京报》的发行情况：

《京报》由政府刊行，在北京叫‘京报’(king-paou)……在地方叫‘京抄’(king-chaou)。该报由北京发向各省，但极少按时到广州，一般需40到50天，有时要60天。它有大小两种型号，均为手抄本。大号每日一期，40页左右，20大张；小号50来页，隔日一期。大号是专为高级官员如总督、巡抚而发行的；小号则是省里那些下级官员看的，他们得花高价从文吏那里购买，也有人花较少钱租来看。有钱的人通过朝里的朋友，可以私下搞到最好的版本。^②

应该说，清代的《京报》具备了很多现代意义上报纸的特点：有固定的报名、活字印刷、每日发行、有配套的发行机制，体现出了某些传媒工具的性质和向近代报刊发展的趋向。但《京报》只是对朝廷官方文书“邸报”的转抄，其内容主要是皇帝谕旨和朝

^① See, 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Kelly and Walsh, 1933, p. 9. 到晚清时期，京城经营《京报》的知名报房逐渐发展到11家。参见白润生，上引书，页20。

^② See, R. Morrison, "Peking Gazett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Canton, Vol. 1, April 1833, pp. 506-507.

廷动态,是以统治阶层或上层社会人士为对象,故而政治性有余,而新闻性、大众性、舆论性不足,因此,还不属现代意义上的报纸。^①

二、早期耶稣会士对《京报》的关注

早期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那些曾经在宫廷服务的耶稣会士有很多机会接触和阅读《京报》。^②其中,法国来华耶稣会士龚当信(Cyr Contancin, 1670-1733)对《京报》的介绍和翻译尤其值得关注^③,他第一次提到《京报》是在1725年寄回本会的报告中。龚当信这次报告的内容是介绍中国皇帝的治国之道,他发现“中国的邸报对于治理国家非常有用”,因为“中国政府是很完善的君主制,全国各地事无巨细都要向它汇报,这种邸报在指导各地官员履行他们的职责、告诫文人和老百姓方面能起很大的作用”^④。

龚当信在两年后给苏西埃神父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是在1723年的排教事件后,才开始注意到《京报》的。^⑤随着对《京报》阅读和了解的增多,他对这种“在全国流通的邸报”越来越感兴趣。他在信中花很长篇幅对《京报》的内容和形式做了一番介绍:“邸报是一本集子,有六十页至七十页,每天都有”。龚当信发现邸报“几乎包括了这个辽阔帝国的所有公共事务,它刊登给皇上的奏折及皇上的批复、旨令及其施予臣民们的恩惠”。^⑥他还专门以某期《京报》为例,详细地介绍了该期《京报》,并节译了其中

^① 参见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1页。

^② 鲁保禄教授(Dr. Paul Rule)提示(在此特向鲁保禄教授致谢),在早期来华耶稣会士的一份拉丁文文献中,提到过“全国发行的公报”(即《京报》)。See, *Brevis Relatio eorum quae spectant ad declarationem Sinarum Imperatoris Kam Hi, circa coeli, Cumfucii et eorum cultum, datam anno 1700*. 可见在龚当信之前,早期耶稣会士已经留意到《京报》,但他们是否翻译过《京报》尚待考证。

^③ 龚当信1710年来华,初驻广州,1711年进京。1731年回法国,曾协助杜赫德校订《中华帝国全志》。参见[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第580-582页。

^④ 龚当信还列举了《京报》上的一些内容,比如关于官员升迁的消息、判决罪犯的案例、皇帝亲耕的日子等等。参见“耶稣会传教士龚当信神父致本会爱梯埃尼·苏西埃神父(Etienne Souciet)的信”(1725年12月2日于广州),[法]杜赫德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大象出版社,2001,页189-196。这里译文虽然是“邸报”,但笔者以为译为《京报》更为妥帖。龚当信的法文原文为“la Gazette publique”,考狄称为“la Gazette de Peking”,有强调“公开”、“在北京”(发行)之义。See,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5 Vols, Paris, 1904-1924. p. 538. 而且《京报》之名在清代已固定下来,为通称。

^⑤ 该事件起因是福建两名多明我会教士和地方政府发生纠纷,福建总督满保上奏皇帝请求全面禁教。雍正下诏将各省传教士遣送到澳门,后经在京的耶稣会士多方周旋,所有天主教传教士被遣送到广州。该事件始末参见“耶稣会传教士冯秉正神父致本会某神父的信”(1724年10月16日于北京),《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二卷,页314-342。龚当信发现对于他们“至关重要的”这次事件,其“前后经过都刊登在邸报上”,这一偶然发现促使他开始留意《京报》。

^⑥ 参见“耶稣会传教士龚当信神父致本会爱梯埃尼·苏西埃神父的信”(1727年12月15日于广州),

的二十则内容:

这本邸报首先刊登了二三十个奏本;其次,刊登了皇上当天对其他好几个奏章的批复……第三,邸报上还刊登有皇上的指示和旨令……第四,从邸报中可以看到,经过朝廷商议决定后呈报给皇上审批的奏章;最后是各省主管大官,诸如总督们、守边的满汉将领及其一品朝臣们呈报皇上的奏章。这种邸报每年出三百本集子,仔细读一下邸报,可以学到举不胜举的各方面的很有意思的知识。^①

在龚当信看来,大部分传教士忽视了这种邸报,或偶有所闻,但并没有去阅读邸报,是很令人遗憾的。他告诉苏西埃神父:“我向您承认我从未想到读这种邸报竟会对一个传教士有如此大的用处。我后悔在中国过了二十年没有去读它”。^②

龚当信的这封信在法国倍受欢迎,被杜赫德编入《耶稣会士书简集》第十九卷,杜赫德还致信龚当信,让他多介绍一些相关的情况。^③这封信此后还被法国权威的《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avants)转载。^④可惜龚当信随即返回法国,在华耶稣会士书信中关于《京报》的介绍似乎也由此中断。

三、新教传教士对《京报》的翻译

1815年,英国在华东印度公司的印刷所刊印了一本英译《京报》合集,译者就是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⑤笔者推测这应该是最早的英译《京报》出版物,甚或是《京报》英译的最早尝试。^⑥马礼逊在给伦敦会的报告和给美部会的通讯中,也附送过他节译的《京报》。^⑦此外,他在英国《大不列颠皇家亚洲学会学报》(Transactions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三卷,第241-268页。

^① 同上。

^② 同上。

^③ 杜赫德给龚当信寄去了载有那封信的第十九卷《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这里是指1702年至1776年出版的34卷本。参见“耶稣会传教士龚当信神父致本会杜赫德神父的信”(1730年10月19日于广州),《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三卷,页312-339。在回信中,龚当信又摘译了一些邸报上的报道。

^④ 该信刊登于1730年2月号。See, Frederique Touboul Bouyeure, “La Chine dans le Journal des savants (1688-1765)”, Actes du V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de Chantilly: Succès et échecs de la rencontre Chine et Occident, du XVIIe au XXe siècle, San Francisco, 1993, pp. 237-255.

^⑤ See, R. Morrison, *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with Notes*, Canton, the Hon. E. I. Co.'s Press, 1815. 该译本序言的注释里交代为马礼逊译自北京刻印的报纸。See, Henri Cordier, *op. cit.*, p.538.

^⑥ 在马礼逊之前,第一个习汉语的英国人是英使斯当东之子托玛思·斯当东,曾任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但托玛思·斯当东节译《京报》始自1821年,较马礼逊译《京报》晚。See, Henri Cordier, *op. cit.*, p.538.

^⑦ See, R. Morrison, “Foreign Correspondence”, *The Missionary Herald*, A.B.C.F.M., 码 Boston, Massachusetts. Vol.17, Jan. 1821, pp.197-198.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23-, London) 上, 也发表过《京报》译文。^①

但马礼逊所译的《京报》, 更多的是刊载在当时西人在华南沿海所办的英文报刊上, 其中有马礼逊自己在马六甲创办的《印支搜闻》(The Indo-Chinese Gleaner), 以及英国商人在广州办的《广东纪录报》(Canton Register) 等。马礼逊比较固定地为这些报刊提供《京报》译文, 作为关于“当代中国”的主要新闻来源, 内容大多为饥荒、叛乱、皇室活动、禁教通告等。^②《印支搜闻》停刊后, 马礼逊也为《广东纪录报》提供过《京报》译文。^③马礼逊此举, 为在华外报节译、转载《京报》之始。但是, 毕竟《印支搜闻》、《广东纪录报》极少在欧、美发行, 因此, 这两种刊物对《京报》的节译在西方的影响不大。

真正通过报刊形式将《京报》在西方广为传播的, 始自《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丛报》是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广州创办的一份英文月刊。该刊创刊于1832年, 停刊于1851年。发行对象主要为在华外侨、美国和英国本土以及东南亚、澳洲、非洲等地的读者, 基本上覆盖了整个英语世界。《丛报》为第一份面向西方读者, 以介绍、研究中国为主要内容的英文报刊。19世纪上半叶, 外人在华所创办的中英文刊物计有几十种, 《丛报》为当时同类刊物中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者。^④

裨治文对《京报》的关注, 应该是来自马礼逊的影响。早在1831年4月的日记中, 裨治文就发表过他对中国的印刷、出版以及地方抄报等方面的看法。^⑤此后在他的日记上还多次出现大段《京报》译文。^⑥《丛报》创刊后, 该刊在编辑、排版等方面继承了《印支搜闻》的诸多传统, 也包括对《京报》的节译。

《丛报》“新闻杂俎”一栏是该刊最固定的栏目之一, 所报道的是关于中国的动态消息, 因而是该刊最具新闻性, 也是关心中国局势的读者最感兴趣的部分。自第一期

^①《丛报》卷二介绍过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第十次年会(1833年)的消息, 提到该会学报上有8篇涉及中国的文章, 除此以外, 该学报上还节载了一部分《京报》和地方抄报的内容, 由马礼逊和德庇时合译。See, R. Morrison, "Literary Notices: The T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March 1834, p.516.

^②《印支搜闻》自第一卷第三号上开始登载《京报》译文, 此后很少间断。See, *The Indo-Chinese Gleaner*, Vol. 1, No. 3, Feb. 1818, pp. 44-57. 该刊自第15期起栏目调整, 此后《京报》主要刊登在“印中新闻”(Indo-Chinese News)栏目中。

^③See, R. Inglis, "Notices of Moder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May 1835, p.23.

^④伦敦的《便士报》(Penny Magazine)称其“即便是和在英国出版的刊物相比, (《丛报》)也毫不逊色”。See, *The Penny Magazine* (1832-, London), Aug. 5, 1837. 该刊由英国“实用知识传播会”于1832年3月31日创办, 后来很快被广大读者接受。每周六发行, 主要针对中、下阶层读者。

^⑤裨治文1831年4月8日日记, 发表在《教士先驱报》1832年5月号上。See,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28, May 1832, pp. 137A-138A.

^⑥裨治文1835年12月1日、12月6日、1836年2月2日日记。See, E. C. Bridgman, *Glimpses of Canton: the Diary of Elijah C. Bridgman, 1834-1838*, foreword by Martha Lund Smalley. New Haven, Conn.: 1998.

起,该栏关于“(中国)全国最近发生的事件”,皆摘译自《京报》。《丛报》编者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获得关于这个帝国现状的最准确的信息”^①。对旨在提供一个“最真实的中国”的《丛报》而言,节译《京报》、直接登载来自中国官方的最新消息,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在那些来源于《京报》的新闻前面,《丛报》一般会加上“从《京报》我们得知…”,或“据《京报》…”等类似的说明。^②此后对来自《京报》的消息,一般会有类似的说明。也有不做任何交代的,但根据其内容,仍大致可判断出那些来自《京报》的内容。

《丛报》所载《京报》译文一般为节译或编译,但如有特殊需要,也会将《京报》的某一则内容完整地翻译出来。并且,《丛报》编者还会将成篇的《京报》译文从“新闻杂俎”调整到该刊的主要版块“专论”一栏,成为一篇独立的文章,以达到引导舆论、刺激争论的目的。如鸦片战争前当在华外侨就鸦片贸易是否道德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时,该刊1836年7月号上就刊载了太常寺卿许乃济奏请弛禁鸦片的那则奏章的完整译文。^③在1837年1月号上,《丛报》在“专论”部分,甚至连着登载了三篇译文,即朱罇、许球的奏折和皇帝就此颁发的谕旨。^④

鸦片战争期间和之后,尤其是随着外人入驻香港和五处口岸的开放,中外关系的格局趋于“国际化”和复杂化。《丛报》读者对中外条约履行情况和外人在华外交、商贸上状况的变化尤为关注。《丛报》的“新闻杂俎”版块的重心,开始明显地向关于中外交涉的消息倾斜。由此一来,《京报》节译的内容不仅从“专论”版块逐渐淡出^⑤,退回到“新闻杂俎”栏目中,而且,在“新闻杂俎”中的比例亦越来越少。尽管如此,此后《丛报》所载《京报》译文中,仍不乏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如该刊在最后两卷中报道的关于太平天国的消息^⑥,就节译自《京报》上的朝廷奏章,根据目前可考的资料,这应该是西文出版物中关于太平天国的最早记载。

《丛报》早期所刊载的《京报》内容,一般由马礼逊父亲和裨治文所译,后来詹姆士、卫三畏任《丛报》编辑期间,也节译过《京报》。当时在华西人中通汉语者为数不

^① “Journal of Occurrenc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3, pp.44-45.

^② See, J. R. Morrison, “Journal of Occurrenc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 June 1832, pp.78-80.

^③ See, J. R. Morrison, “Opium: memorial to the emperor proposing to legalize it”, CR, Vol. 5, July 1836, pp.138-140.

^④ See, J. R. Morrison, “Memorial of Choo Tsun on Opium”; “Memorial of Heu Kew against the Admission of Opium”; “Imperial Edict, referring the memorials on opium”,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Jan. 1837, p. 390; Vol. 5, Jan. 1837, p. 398; Vol. 5, Jan. 1837, p.405.

^⑤ 《丛报》“专论”中最后一次登载《京报》译文为马儒翰所译。See, J. R. Morrison, “Memorial from Keshen & Emperor’s Repl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Feb. 1841, pp.108-115.

^⑥ S. W. Williams, “Memorial Respecting Disturbances in Kwangsi”; “Disturbances in Kwangxi, and papers connected with them”,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9, Sept. 1850, p. 511-512; Vol. 20, July, 1851, pp.492-500.

多，有能力翻译《京报》的寥寥可数。《丛报》凭借节译《京报》这一优势，能够准确、快捷地报道中国官方的消息。或许这也是《丛报》较当时其它英文刊物更为成功的原因之一。

应该说明的是，《丛报》上所介绍和节译的“京报”其实是一个复数概念，包括正式的《京报》和其它形式的抄本。除《京报》外，《丛报》的“新闻杂俎”部分，还节译了一些地方政府发行的“辕门报”^①，这是《丛报》关于本地消息的来源之一。此外，马礼逊注意到中国市井还流行一种不属官报的地方小报。^②马礼逊称《京报》为“Peking Gazette”^③，但他认为市井“小报”不能称之为“Gazette”。因为此类小报太粗糙，“不过是一张纸片，报房在上面印一些奇闻逸事。每份售值为一个铜板，每八百到一千铜板合一两银。这种只值一文钱的货色，有点像欧洲的报纸。但它们与欧洲报纸相去甚远，因此根本不配称之为报纸”。^④

亨特的《旧中国杂记》中，有很多描述外人在广州的生活，以及外人和中国人交往情形的片段。其中有一首戏拟英雄体史诗的《伙计史诗》，是用来讥讽在外国人当中混得很熟的某行商的儿子在鸦片战争中的滑稽行为。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Nimrod then inspected	大人于是验看
The papers which they had selected,	他们交上的纸张，
And, after looking them well over,	大人从头到尾看过之后，
His rising mirth could hardly smother	笑得喘不过气来：
‘I find in these there’ s nothing yet’ ,	这些是什么破玩意儿，
Said he, ‘but old Peking Gazette’ . ^⑤	只不过是一些老掉牙的《京报》。

从这一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京报》在外人当中是极为常见的。那么，他们是通过何种途径得到《京报》的呢？

裨治文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及这方面的情况：“传到广州的《京报》为数不多，一般是由政府专员或私人信差送达，后者往往先到，大量的抄本就是根据这几份翻抄而来”，因此，《京报》“在省里，是以抄本形式出现”，其中，“好一点的是大号本，较次一些的就是小号本”。^⑥当时传抄《京报》者应该为数不少，据卫三畏称：“在外省，成

^①“辕门报”或“辕门抄”是清朝出现的、由各省督抚衙门发布的官方文书，主要发给所属府、州、县。参见白润生，上引书，第20页。

^②自北宋末年，开始有一种非官方的“小报”在市井流行，被读者称为“新闻”或“新闻纸”。发行人是一部分中下级官员和书肆的主人，属政府查禁之列。参见白润生，上引书，第17页。

^③据马礼逊介绍，“Gazette”词源为拉丁文“Gazetta”，其本义是指威尼斯的一种小硬币。后来因为城里刊发的第一份报纸的价格为这样一个硬币，人们便以这种硬币来称呼这种报纸。久而久之，“Gazette”成为西方报纸的统称。See, R. Morrison, “Gazett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 pp.492-493.

^④R. Morrison, “Gazett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 pp. 492-493.

^⑤William C.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Kelly and Walsh, Ltd., Shanghai, 1911, pp. 47-51. 黑体部分为笔者所加，右栏为笔者译文。

^⑥裨治文接着翻译介绍了一份完整的抄报，为15道上谕，含道光十五年十二月十三、十四（阳历1836年1月30-31日）两天的内容。由此可推测，裨治文他们所接触的多为这种小号本。See, E.

千上万的人抄编《京报》，卖给那些得不到全本的人，以此谋生”^①。

可见，在华外人获得《京报》的途径之一，就是从那些抄卖《京报》的小贩处直接购得，他们所得到的多为《京报》抄本。若按马礼逊所言，《京报》由京抵粤需一到两个月时间的话，外人由此“正当”途径获得的《京报》抄本，应该是在《京报》印发几个月之后。但从《丛报》所载内容来看，有一部分译自《京报》的新闻来得相当快捷。如林则徐在1838年12月才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丛报》在次年1月号上就刊发了他被派往广州禁烟的消息。^②很显然，在华外人应该另有其它途径，可以更加迅捷地获得来自北京的消息。

在中文文献中，也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外人如何获取《京报》的线索。据道光年间浙江巡抚刘韵珂的奏折称：

臣等每日所阅《京报》，系由坐京提塘抄寄坐省提塘转送，惟闻此外尚有‘良乡报’、‘涿州报’名目，其所载事件，较详于提塘之报，递送亦较为迅速，闻良乡、涿州等处，专有经理此事之人，官绅人等多有以重资购阅此报。故各省之事，有臣等尚未知而他人先知之者，亦有臣等所不知而他人竟知之者。伏查为逆夷递送《京报》，固系外省奸民之所为，而代为传抄《京报》之人，恐亦不止一处。^③

据此可以推测，外人可通过所谓“官绅人等”购买那种递送迅速的“良乡报”、“涿州报”的《京报》抄本；为他们提供此方便者，或为那些和外人关系密切的行商、买办、通事等。

《丛报》1839年5月迁到澳门后，获得《京报》的这两种途径均被切断。该刊当月号的“新闻杂俎”异常简短，没有任何关于中国的消息。《丛报》编者在前言中对此的介绍是：“本月几乎所有获得关于这个帝国的消息的途径都被切断，我们没有收到《京报》和其它的材料”。^④

四、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对《京报》态度的异同

值得注意的是，除节译《京报》作为“新闻杂俎”一栏的主要内容外，《丛报》上还刊载了马礼逊、裨治文等撰写的大量评论和分析《京报》的文章。在《丛报》卷五一篇题为《新闻刊物：中国的出版状况》的文章中，裨治文介绍了中国发行的几种定期出

C. Bridgman, "Periodical Literature, with remarks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press i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May 1836, pp.1-12.

^① See, S. W.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Wiley and Putnam Press, 1848, Vol. 1, pp. 328-329.

^② See, E. C. Bridgman, "Journal of Occurrences: Appointment of Lin Tsihseu to Cant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7, Jan. 1839, p.504.

^③ 参见“浙江巡抚刘韵珂等奏遵旨密拏为逆夷递送京报者”（道光二十二年六月），《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67年，页17-18。刘韵珂此摺与《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十七所录有出入，此处从“补遗”说。

^④ See, "Journal of Occurrenc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8, May 1839, p.56.

出版物：即历书 (Almanacs)、官历 (the Court Calendar)、辕门报 “yuen mun paou”，还有《京报》。《丛报》上刊载过一篇专门分析《京报》的文章，将《京报》的内容分为六大类，即：官职调整、军队布防、司法判案、财政税务、边疆属国、杂录，旨在说明如何通过对这些“文件”进行综合、细致的分析，就可以“洞悉中国政府的机制和政策”^①。

如果将马礼逊、裨治文等新教传教士对《京报》的评价和早期龚当信的看法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时隔一百多年后，新旧传教士对同一事物的评价和态度有诸多值得关注的异同之处。

1. 知识与兴趣的承袭

但在讨论这个异同之前，首先要看到的是，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书信及出版物，是18世纪及19世纪初期西方人认知中国的主要途径，更是他们的后来者、19世纪初期第一批来华新教传教士行动的重要参考和指南。

有理由认为，龚当信发表在《耶稣会士书简集》上关于《京报》的介绍，会引起英国人对此的关注。^②斯当东在1793年随第一个英国使团来华时，就注意到了在北京发行的这种报纸。在他那本后来在英语读者中非常流行的中国游记中，斯当东对《京报》做了简短的介绍：

邸抄在政府的指导下在北京经常发行。它的内容主要登载全国的重要人事任免命令，豁免灾区赋税的命令，皇帝的恩赐，皇帝的重要行动，对特殊功勋的奖赏，外藩使节的觐见，各地的进贡礼物等等。皇室的事务和私人日常起居很少登在邸报上。邸报内容只限于国内事务，国外事务一概没有。^③

从内容来看，斯当东对《京报》的介绍仍没有超出龚当信所提供的信息。^④但斯当东对《京报》的最后一句评价，应该是出自他自己的认识。斯当东随使团来华时，欧洲报业在新兴印刷机器的推动之下，正值蓬勃发展之际。斯当东虽然没有提到欧洲的报纸，但仍是隐含了一番比较的：和欧洲的“现代”报纸相比，《京报》的新闻覆盖面和时事功能显然不足，因此就有“国外事务一概没有”这样的批评。

龚当信关于《京报》的介绍，不仅会影响一般关注中国的欧洲人的视角；更会激起后来传教的马礼逊对《京报》的异常兴趣。而裨治文来华后学习中文以及创办《丛报》，均是在马礼逊的指导和支持下进行的，裨治文对《京报》的关注，应该是来自马礼逊的影响，这是《丛报》的新闻栏目节译《京报》的由来。

^① See, J. R. Morrison, "Analysis of the Peking Gazett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7, Aug. 1838, pp.226-231.

^② 迟至十九世纪上半叶，在普通英国人当中较为流行的《便士报》在介绍中国时，仍将耶稣会士李明、杜赫德等的作品作为权威文献。可见，在英国对中国的实地考察的记载出现之前，耶稣会士对中国的描述是英国人了解和想像中国的主要来源。See, "China, No. 1", *Penny Magazine*, No. 214, Aug. 1835.

^③ [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394页。

^④ 笔者以为，如果将《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和斯当东的游记放在一起比较，研究前者在建构后者对中国的“先在形象”中的作用，将会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至此，我们似可以这样理解：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京报》的兴趣，与他们的前辈天主教传教士之间，有一定的承袭关系。从龚当信到马礼逊，再到裨治文的《丛报》，这期间有一个环环相扣的影响链。

2. 态度的异同

在龚当信看来，《京报》很有教益，不仅有助于皇帝“教导官员们更好地治理百姓”，具有特殊的教化功能；^①而且，有助于在华的传教士“了解中国的风俗，获得有关中国的宗教、学说、法规、待人接物等各方面的知识，还可从中学习遣词造句，提高中文表达能力”等。因此，他认为《京报》“不仅对中国人有用，尤其对一个欧洲人很有用”^②。

龚当信还将《京报》和欧洲的报纸相比较，他认为《京报》更具优越之处。因为，“在欧洲，有些地方此类报纸充塞了无稽之谈，恶言中伤，造谣诬蔑”；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的邸报只登与皇上有关的事情”^③，而且，“《京报》上的事实是真实可信的，都是摘自奏章、调查报告、颁发全国的皇帝的训示和指令，其事实是真实可信的。”^④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新教传教士对《京报》的特别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与龚当信对此的介绍有密切的关系，但我们看到，一百多年后，他们对《京报》的兴趣点已经发生了变化。

马礼逊在《丛报》上一篇专门讨论《京报》的文章中谈到，“《京报》上最难以理解之处是那些浮华的、歌颂皇帝的誉美之词，用的是那些中文古书里的套词，皇帝被比做圣人、神、甚至是天”。至于《京报》上那些关于官员任免、升贬等的消息，“对不关心他们的派别的外国人来说，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⑤很显然，《京报》上那些在龚当信看来体现皇权的内容，对马礼逊而言恰恰是“最难以理解之处”。

裨治文也曾撰文评价《京报》，尽管他认为《京报》是中国出版物中唯一接近西方“现代”报纸的形式，但他仍认为，《京报》“没有思想、没有文采，君主只不过借此将他的权威周知天下”，根本无法和欧洲的报刊相提并论。^⑥另一位传教士麦都思也认为，《京报》虽然“载上谕奏折，仅得朝廷举动大略”，中国还没有称得上报纸的东西。^⑦对马礼逊、裨治文他们而言，《京报》的可取之处是其情报价值，而不是龚当信所心仪的圣君治国之道。

总体而言，龚当信与马礼逊、裨治文对《京报》的态度可谓褒贬分明。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对《京报》的兴趣上毫无共通之处。如前所述，新教传教士

^① “耶稣会传教士龚当信神父致本会爱梯埃尼·苏西埃神父的信”（1725年12月2日于广州）。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See, R. Morrison, “Peking Gazett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 April 1833, pp. 506-507.

^⑥ See, E. C. Bridgman, “Periodical Literature, with remarks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press i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May 1836, pp.1-12.

^⑦ 麦都思：《遐迩贯珍》“创刊词”，1853年8月，第3页。

对《京报》的关注与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天主教传教士那里承袭而来。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京报》的认识有某些相同之处，即他们都认识到了《京报》这一来自皇宫的官方文书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在龚当信看来，“只登与皇上有关的事情”的《京报》，其新闻要远比欧洲报纸的“无稽之谈”更为可靠。而马礼逊、裨治文等人也肯定《京报》的权威性，《丛报》将《京报》译文作为“新闻杂俎”一栏的重要部分，这本身就是对《京报》的权威性和真实性的肯定。无论龚当信还是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都看到了《京报》“对欧洲人有用”之处，这也是他们翻译《京报》、以此来向西方传递关于中国的知识和情报的原因。

3. 态度差异的原因

龚当信和裨治文等人在将《京报》和欧洲报纸相比时，前后得出不同的结论，究其原因，应该是时代背景和对中国心理期待上的差异使然。

龚当信所处的年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夜，辉煌的路易十四时代（1643-1715）已经结束，法国的绝对君主制正走向衰败。代表着最保守势力的耶稣会士，怀着对当下动荡的，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的焦虑和对明君的渴望，龚当信看到了《京报》有助于统治者“教导官员们更好地治理百姓”的作用，因此，他所强调的是《京报》的教化功能。我们看到，龚当信在将《京报》和欧洲的报纸相比较时，是从可信度出发的，因为《京报》“只登与皇上有关的事情”，而这个皇上推行的是“完善的君主制”，因此，《京报》的权威性和教益作用自然是那些欧洲的地方报纸无法比拟的。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是长期的，后来与裨治文他们同时期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古伯察，也仍然认为《京报》的意义在于“皇帝通过嘉奖和惩戒，以扬善抑恶”，从而具有“全面监督（Moniteur Universal）”的教益功能。^①

但是，时隔一百多年后，龚当信眼里（中国的）“完善的君主制”，在裨治文他们看来，与西方新兴的民主制度相比，只不过是一个弊端百出的专制政权而已。显然，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背景决定了这一认识上的差异。再者，19世纪初西方新闻业已发展得较为完备，按照西方的标准，《京报》自然不具备现代报刊的要求，这也是裨治文认为《京报》“无法和欧洲的报刊相提并论”的原因所在。

除此之外，他们在中国观上的差异，也使他们从不同角度来看待同一事物。尽管龚当信在华时，正是清廷严厉打击天主教之时，龚当信本人及其同伴被遣送到广州。但是，18世纪的欧洲正值“中国热”的大气候之中，而且，天主教传教士在清初宫廷中所曾受到的礼遇和过去在中国所达到的成就，也会使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制度和文化的文化依旧充满好感。

而对19世纪初第一批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来说，一方面，19世纪初至鸦片战争前正是中西关系发生剧变的前夜，是西方之中国观发生“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的转折时期^②；另一方面，他们此时在华的传教事业尚在艰难开拓时期，倍受挫折，他们对中国

^① See, Roswell S. Britton, op. cit., p. 12.

^② 法国学者艾田蒲（Rene Etiemble, 1909-2002）认为，十九世纪上半叶是西方之中国观发生“从

的感情是复杂的。因此，马礼逊、裨治文等人对《京报》价值的肯定，并不在于其教化功能，而是其新闻和情报功能。

五、《京报》节译在中西方的反应与影响

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而言，龚当信、马礼逊、裨治文等人翻译《京报》的活动在中西方均有其积极的影响。

传教士们所译的《京报》，还为那些身在欧洲的汉学家提供了关于中国的新鲜素材。如龚当信讨论《京报》的信曾被《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avants*, 1730年2月号)转载。法国的学术杂志《亚洲研究》(*Journal Asiatique*)上还刊载过研究《京报》的专文。^①另据《丛报》记载，英国的《伦敦评论季刊》(*London Quarterly Review*)曾就《京报》所反映的中国制度组织过专门的讨论。^②

在中国，新教传教士通过《丛报》等报刊对《京报》的节译，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在华出版的报刊的新闻采编方式，节载《京报》逐渐成为在华外文报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后期，在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等刊，不仅保留了节译《京报》这一传统，还曾多次将所载《京报》译文结集出版。^③外人在华所办中文报刊、以至后来中国人自办的报纸也沿用此习，节载《京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自1837年复刊后，在该年4月号上也开始转抄《京报》，成为第一种转录《京报》的中文报刊。^④此后1853年在香港刊行的第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亦在“近日杂报”一栏节录《京报》。《申报》自1882年起，特地以附张形式单独刊行《京报》全文。^⑤上海《苏报》也于1896年起全录《京报》。^⑥综观十九世纪中国报业，可谓中西文混杂，报、刊不分，教、俗并存，有意思

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的重要转折时期。参见[法]艾田蒲，上引书，第四部“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第383-393页。

^① 《亚洲研究》将《京报》译为“*Gazette de Pe-King*”或“*Gazette Chinoise*”。See, Henri Cordier, op., cit., p. 538; 《丛报》提到《亚洲研究》1833年12月号曾有文介绍《京报》的编撰和发行过程。See, R. Inglis, “Notices of Moder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May 1835, pp. 22-23.

^② See, E. C. Bridgman, “Periodical Literature, with remarks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press i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May 1836, pp.11-12.

^③ 《北华捷报》出版社第一次结集出版1853年至1856年《京报》的内容，由麦都思所译。麦都思过世后，这一翻译活动一度中断，自1872年起，该出版社又开始陆续出版《京报》的专集，基本上两年一册。See, Henri Cordier, op., cit., p.538.

^④ 参见“新闻：奏为鸦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丁酉年四月号。裨治文自1837年起成为该刊的两位撰稿人之一（另一位为郭实腊），该刊转载《京报》应与他有一定的关系；而且，该刊丁酉年四、五、六月号上所节译的《京报》内容，正是许乃济、许球等人关于鸦片的奏折。译文后面还加按语指责鸦片贸易，郭实腊为鸦片贸易的支持者，此文应为裨治文手笔。

^⑤ 参见《京报》，第1号，上海申报馆。该报馆发行的《京报》一般是连号刊出，一号为一页，封面书“x年x月x日京报全录”，中缝有“申报附张不取分文”字样。

^⑥ 参见《京报》，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号，上海苏报馆。

的是,节译或转载《京报》倒是这形形色色的报刊中所共有的一种现象。

对当时那些在华的外侨而言,《京报》的翻译则为关心中国时务者提供了及时、可靠的新闻。马儒翰等人曾根据《京报》上的这些信息,整理出一系列介绍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府机构的文章,上有北京和全国各地官员的详细名单。^①对当时的在华外人而言,《京报》无疑是获取中国政治情报的最好工具之一。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就曾向道光帝奏报义律购买《京报》,借此刺探情报之事。^②此后,又有耆英就进犯吴淞的英人“每日阅看京报”一事再次上奏。^③此事引起一桩不小的“《京报》案”。^④

有趣的是,与此同时,林则徐正组织人翻译西书西刊,以“刺探夷情”。如果将两者相比较,就会发现这是近代中西关系史上中西“初识”之际非常有趣的一组现象:一个是西方人“看中国”,一个是中国人“看世界”。或许两者对彼此的无知和偏见程度不一样,但这种急欲了解对方的心态是相同的。而近代中西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正是从这样初步的“互看”开始。从这一点而言,传教士翻译《京报》的“中介”作用也是值得一书的。

(责任编辑 辛岩)

^① See, J. R. Morrison, "List of Person Holding Office in China"; "List of Officers at Peking in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Feb. 1836, p. 473; Vol. 12, Jan. 1843, p. 20. 在一篇题为《北京政府机制》的文章中,马儒翰就表示通过阅读《京报》可以熟悉这些繁杂的头衔名称。See, J. R. Morrison, "Local Government of Peking",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Aug. 1835, p. 188.

^② “林则徐等又奏英人非不可制请严谕查禁鸦片片”(道光十九年七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

^③ “耆英又奏英人每日阅看京报请敕密查摺”(道光二十二年六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十四。

^④ 道光为此连发两道谕旨,先后责令两江总督牛鉴、浙江巡抚刘韵珂等严密查拏,“将递送该逆京报之人”“一经弋获,即著确讯如何辗转递送实情,从严惩办”。参见“廷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十四;及“廷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十七。

耶稣会士与新教传教士对《京报》的节译

作者: [尹文涓, Yin Wenjuan](#)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
刊名: [世界宗教研究](#) PKU CSSCI
英文刊名: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年, 卷(期): 2005, ""(2)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41条)

1. [Roswell S. Britton](#) [查看详情](#)
2. [R Morrison](#) [Peking Gazette](#) 1833
3. [卓南生](#)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2002
4. [费赖之, 冯承钧](#)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1995
5. [杜赫德, 郑德弟](#)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2001
6.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7. [耶稣会传教士龚当信神父致本会爱梯埃尼·苏西埃神父的信](#)
8. [耶稣会传教士龚当信神父致本会杜赫德神父的信](#)
9. [R Morrison](#) [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with Notes, Canton](#) 1815
10. [R Morrison](#) [Literary Notices: The T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34
11. [查看详情](#)
12. [R Inglis](#) [Notices of Modern China](#) 1835
13.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4. [J R Morris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2
15. [J R Morrison](#) [Opium: memorial to the emperor proposing to legalize it](#) 1836
16. [Imperial Edict, referring the memorials on opium](#) 1837
17. [J R Morrison](#) [Memorial from Keshen & Emperor's Reply](#) 1841
18. [Disturbances in Kwangxi, and papers connected with them](#) 1851
19. [R Morrison](#) [Gazette](#)
20. [R Morrison](#) [Gazette](#)
21. [William C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1911
22. [E C Bridgman](#) [Periodical Literature, with remarks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press in China](#) 1836
23. [S W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1848
24. [E C Bridgman](#) [Journal of Occurrences: Appointment of Lin Tsihseu to Canton](#) 1839
25. [浙江巡抚刘韻珂等奏遵旨密拏为逆夷递送京报者\(道光二十二年六月\),《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 1967
26. [Journal of Occurrences](#) 1839
27. [J R Morrison](#) [Analysis of the Peking Gazettes](#) 1838
28. [斯当东, 叶笃义](#)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1997
29. [耶稣会传教士龚当信神父致本会爱梯埃尼·苏西埃神父的信](#) 1725
30. [R Morrison](#) [Peking Gazette](#) 1833

31. [E C Bridgman Periodical Literature, with remarks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press in China](#) 1836
32. [麦都思 遐迩贯珍创刊词](#) 1853
33. [R Inglis Notices of Modern China](#) 1835
34. [E C Bridgman Periodical Literature, with remarks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press in China](#) 1836
35. [新闻:奏为鸦片](#)
36. [查看详情](#) 光绪二十
37. [List of Officers at Peking in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1843
38. [J R Morrison Local Government of Peking](#) 1835
39. [林则徐等又奏英人非不可制请严谕查禁鸦片片\(道光十九年七月\)](#)
40. [耆英又奏英人每日阅看京报请敕密查摺](#)
41. [廷寄](#)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jzjyj200502010.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c4daba10-bd95-4bef-b383-9e4d00774f73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